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逻辑、 目标指向与路径对策

李明星¹ 陈冰²

(1.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2. 四川锦国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课题。基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探析,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的梳理,研究认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在夯实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政策调控与市场激励相结合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确保多种所有制经济活力更强、价格机制反应的灵敏度更高、政策引导调控的靶向更准,其目标得以实现,关键则在于要不断提升党和政府执政能力、持续完善要素配置体制机制、更加优化产权权能结构体系、坚持创新服务供给技术平台、聚力营造共建共享营商环境等。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执政能力;价格机制;营商环境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4)04-0104-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404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界就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解读,如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基本遵循依据^[1],强调要全方位地从经济、政治、文化等维度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以理解和把握^[2],不仅需要在以上方面精准发力,更要增强制度建设的系统性、连续性和协调性^[3],而这又是其自成一体的层次结构性、综合集成性、动态平衡性内涵所决定的^[4]。在2024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次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并就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具体任务进行了部署。鉴于此,笔者认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是一个庚续性、比较性的概念,既包含着对党的十四大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诸多实践探索的肯定与延续,又包含着对未来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涵水平的思考与创新,从这个层面看,要遵循党的二十大的战略要求,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系列部署,就必须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整体描绘。而本研究以此为面向,立足对理论基础和历史发展的分析回顾,总结梳理了高水平社会主

收稿日期:2024-05-26

作者简介:李明星(1996—),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与农业经济管理;

陈冰(1994—),女,四川锦国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经济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指向,并进一步谋划了总体路径和关键策略,为持续深化理论研究和创新实践提供价值参考。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臆想而成的“空中楼阁”,而是基于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总体上看,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理论,主要源自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市场及其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论证。

(一)关于“市场”本质及其运行规律

尽管从文献记载上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明确提及过“市场经济”的概念,但他们却有诸多与“市场”及其运行规律相关的阐释,认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5]193},具体来说,“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的各自产品互相成为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6]718},而“社会分工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7]412},这“恰好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8]663},同时也是市场的基本规律,根本上是平等和自由,并强调“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9]197}。就交换的过程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10]1012},这种变化进一步演变就成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同时强调,“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绝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11]132-133}。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市场的阐释的核心落点是商品中性和价值规律自然性,认为商品市场本身是不具备阶级性的,是从属于自然与社会本质的,这为建立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联系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12]210-211},因此,其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对消费品的分配只能实行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13]304},但这并不妨碍共产主义社会的进一步解放,因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4]74},只有通过解放,才能让共产主义社会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跃变。不难看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是批判的,但对市场经济的作用和价值是肯定的,尤其注重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撑作用。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基础上,列宁和中国共产党人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在经济建设实践中采取一些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发展生产,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发展经济^{[15]268}。毛泽东同志认为,虽然自由市场的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但只要社会需要,我们也可以对其加以利用并发展^[16]。邓小平同志认为,市场和计划都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与形式,相较于社会主义建设而言,是能够实现过程与目标的统一^[17]。从“商品”中性到“市场经济”中性的进一步深化,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正式形成。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要求“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18]164},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与实践实现深度融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具备合理性的,是社会进步过程中工具中

性与体制选择的结合,另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具备特异性的,是从特定的阶级立场出发,面向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科学决策和必要选择。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伴随社会矛盾的复杂演变,经过较长时期探索实践而形成的,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的萌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

(一) 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等形态的错杂交织的复杂局面,为尽快实现社会重建,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解放区早期供给制的经验、党和政府的动员能力、国家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的基本认识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选择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以行政管理为主要机制、以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19],并迅速开启对非公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之所以称之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是其较为明显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传统理解的尊崇,和对“苏联模式”的效仿;另一方面,是其明显的“内生性”特征,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及传统路径。

(二) 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化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开始执行对公有制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以及对非公有制企业(含公私合营)的“估计性计划”管理体制^[20],全面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构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系,管理体制呈现高度集中和统一计划的特征。尽管如此,毛泽东同志认为,只要社会需要,同样也允许自由市场与私营经济的存在,并提出“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21]434}等主张,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也指出,自由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并获得一致认同,但这些思想主张却并没有实质性地付诸实践,把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紧密联系的传统观念没有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框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动摇,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反而使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三) 市场经济体制的萌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结合的道路。我国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和私营经济获得发展机会和空间。党的十二大、十三大进一步提出鼓励个体经济适当发展,将其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补充,邓小平明确指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22]148-151},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23]373}。正是基于这些思想的指导,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得以萌芽生长。

(四)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

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24]17}的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5]17}。因此,党的十四大也被公认为是我国经济体制建设的水分岭,自此,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作为党和国家经济工作的重心,要求到2000年初步建立与计划的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并首次提出了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贡献的对外发展目标^[26],市场开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进一步提出要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7]9},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8]9},全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

就以上回顾来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总体上是沿着“选择→发展→深化”的脉络演进的,在相继完成“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到“怎样发展这样的经济体制”的历史决策之后,开始面对新的“如何提升经济体制能效”的问题,而这也构成了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和目标落点。

三、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立足与目标指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深意何在?学界代表性观点认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为价值取向的新概括^[29],本质是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统一^[30],并体现在价值追求、发展目标、调控手段、开放程度、流通体系等方面,呈现为“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31]。综合来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上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核和“高水平”的表征,即要在承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路径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多方面的水平提升。

(一) 以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赓续为基础

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是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必然结果^[32],其同时也构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底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立足对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性赓续。

1. 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先决的条件赓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都并不鲜见,但二者的融合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大创新,而要确保这种创新能够继续运用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之中,就必然要坚持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领导,这是近百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也是经过长时间实践检验的普遍真理,是最适合国情实际的选择。究其原因来看,关键则在于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能够一以贯之地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为人民谋幸福,能够不断通过完善制度体系有效应对和解决共同富裕面临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能够集中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社会生产发展中,进而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以体现,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得以加强^[33]。

2. 对坚持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赓续。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主导下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一直都是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共同构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结构^[34],因此,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应当以此为遵循,要不断夯实公有制基础,同时要重视和发展非公经济成分,这样才能确保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主体地位的体现,更好地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35],体现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性和优势度。

3. 对坚持政策调控与市场激励相结合的机制赓续。从早期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以政策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律激励相协同的体系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因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应持续赓续这一原则,致力于在政策调控与市场激励之间达成更好平衡,尤其是要就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引导经济健康运行,注重总体宏观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36],践行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价值理念^[37]。

(二) 以对新格局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水平提升为指向

为了更好契合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满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市场制度改革创新、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推进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等^[38],尤其要突出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意涵。

1. 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更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从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再到“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以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最后到将“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稳固和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因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还要增强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尤其是要更加壮大民营经济,实现更多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创新融合。

2. 价格机制反应的灵敏度更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是市场,而市场的动力又源自价格机制,因此,完善价格机制一直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之一。当前我国已经完成内生性演变和系统性改革向市场价格机制的转变^[39],但基于制度和历史等复杂原因,价格机制仍处在调整适应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价格冲突、市场价格调节失灵等问题,因价格反应不及时造成的阶段性、区域性供需失衡时有发生。因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致力于进一步革除价格政策干预的弊端,充分发挥市场形成和调节价格的作用,让市场理性与政府理性达成高效契合。

3. 政策引导调控的靶向更准。一直以来,我国都极为重视发挥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引导调控作用,从早期的全面指标性干预到后来的服务干预^[40],从经济反复出现“热身”“反弹”“硬着陆”“软着陆”等波动^[41]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更趋平衡^[42],政策引导调控呈现出广度逐步缩小和精度逐步提升的特征。今天,在经济多元化发展趋势下,行业极化与市场垄断等短期波动与结构性失衡等问题深度交织,市场非线性变化成为常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就必须致力于持续提升政策调控的精准度,在更好应对“市场失灵”问题的基础上,还要形成经济发展短中长期相结合、国内国际相统筹、改革发展相协调的机制体系,把供给和需求、质量和效益、公平和效率等有机结合起来。

4. 制度机制规制的强度更大。制度机制既是市场经济体制发育完善的产物,同时也是维系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过程也是经济制度及机制不断健全的过程。从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非公有制经济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强化对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强调要“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43]等来看,持续强化制度机制建设是基本共识,尤其是要从法治层面强化其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因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更加完善制度机制,全面确立市场化的生产机制、交换机制、分配机制等在保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居于全局性的基础地位^[44],推动制度机制的成本节约和规制力度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路径及对策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系统性、多维度的发展命题,要针对基本前提、核心指向、关键任务、实践支撑和工作抓手等一体考虑,关键是要坚持系统观和权变观相统一,围绕提升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确保要素配置更加合理,确保产权激励更加有效,确保营商环境更加优良,确保技术服务更加适配等系统推进(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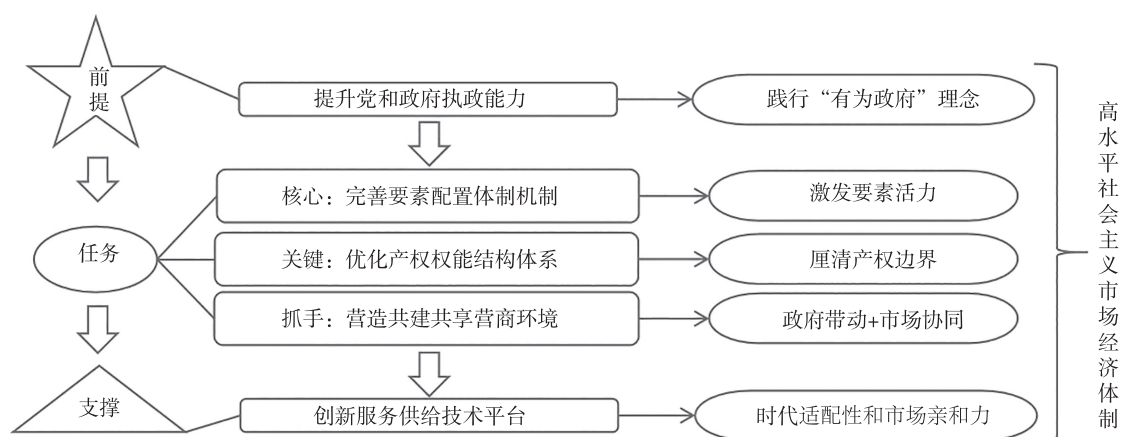


图1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路径

（一）以不断提升党和政府执政能力为前提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心骨,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体力量,这既是党的先进性特征所决定的,也是党的先进性保持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所决定的^[45],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始终坚守这一基本逻辑,着力提升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提升已经不单单是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质量的提升,要深刻领悟“小政府大市场”的基本逻辑,在确保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不断深化践行“有为政府”理念,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具体来说:一是探索政府退出市场竞争的路径与策略,坚持敢于脱钩和加快脱钩的工作导向,尽可能减少政府及其职能职责机构对市场秩序的过度干扰,回归政府作为管理者的角色定位。二是强化政府维护市场规则的意识与效率,在公益性和准公益性领域积极补位,聚力于标红线、建平台、建机制、建渠道和强约束,切实兜牢社会普遍共识的价值底线。三是聚力宏观市场战略布局的谋划与落地,始终锚定前沿性趋势与潜在性问题,做好顶层设计与风险预判,坚持管大局、抓关键,把稳把准面向市场获利和社会获益的发展方向。四是注重政策工具的创新与运用,将革除制约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健全顺应市场发展的利好政策作为工作重点,确保政策工具的创新运用与经济建设并行不悖。五是加快推进体系建设与作风建设,彻底摒弃故步自封和因循守旧的旧思路,以适应市场和服务市场为取向,创新运行模式、严明纪律、严格履职。

（二）以持续完善要素配置体制机制为核心

市场经济既立足于要素配置,又服务于要素配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旨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资源要素的科学合理流动,这是由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加快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发展,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和推动经济增长^[46]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十分重视并积极深化要素合理配置,但总体上看,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仍然不高,资源浪费和要素失衡问题依旧严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着力构建能级更高、辐射更广、效力更强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要素配置体制机制,充分激发要素活力,变现要素价值。具体来说:一是全面放活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格局,努力扭转“捆草饿牛”的现实局面,树立以要素创新开发与高效利用为主要指向的价值理念。二是加快探索以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和数据等为主的多元要素进入市场自由流通的渠道,同时深化劳动力人才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改革,着力构建体系完备的要素市场^[47]。三是要聚力突破生产要素行业垄断等壁垒,通过健全市场规则和加强监督管理,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聚力打破行政性垄断,逐步推动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四是不断完善要素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五是持续优化生产要素收益分配机制,鼓励生产要素相关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分类探索生产

要素参与分配的办法与策略,创新完善以市场为主导和以政策为补充的收益分配模式。

(三) 以更加优化产权权能结构体系为关键

产权是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重要保证,我国坚持以完善产权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抓手,接续开展了包括农村土地“两权分离”和“三权分置”等在内的产权制度改革。不过,我国的产权制度也一直受到理论诟病,一些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的产权制度及权能体系不利于遵守市场原则和提高经济效率的,难以发挥产权的激励效应。

就现实来看,我国产权制度确实存在产权界定不清晰、产权交易不规范和产权保护不完善等共性问题^[48],这对于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等都是较大障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以此为面向,针对自然资源等实体资产和技术知识等无形资产,对产权关系及权能边界加以厘清。具体来说:一是进一步拓展产权制度的覆盖面,要充分考量现实需要及未来发展,最大程度地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纳入产权管理范畴,不仅要重视对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的赋权赋能,更要重视对以数据等为代表的新生要素赋权赋能。二是进一步创新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下的产权结构体系,继续挖掘产权分离及权能分化衍生的潜力,让其更好地适应产权市场化交易的需要。三是持续加强对产权及权能实现的保护,从法律上创新探索赋予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加以平等保护的措施,提高侵权成本,降低维权成本,加强对平等市场主体之间产权纠纷的公平裁决,注重政务诚信建设,使公权力切实成为私有产权的“保护神”。

(四) 以聚力营造共建共享营商环境为抓手

营商环境特指市场外部环境及各类因素的集合,包括政策、司法、行政、制度等规范体系,以及基础设施等实体要素,其与市场化程度呈正相关^[49],因此,强化营商环境优化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近年来,我国将优化营商环境纳入到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任务,强调要“激发市场活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50],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当始终以此为主要抓手,坚持政府和市场相协同,将营商环境理念融入施政理念与行政手段,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市场经济提质的互动。具体来说:一是不断完善政府行政考核机制,关键是要改变传统“唯GDP论”的行政考核措施,将要素平台建设、制度体系完善、服务机制创新、政策有序衔接、市场结构稳定等,统一纳入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工作考核的指标体系,以此引导政府在施政理念和政策逻辑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二是不断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既要聚焦“营场”,着力补齐城市场景的要素短板,既通过构建要素共融渠道和规范要素融合机制引导要素实现价值变现,又要敢于在经济建设中主动退出,对具体行业、具体项目(特殊除外)等要敢于放手,尽量避免对正常市场交互过程的干扰。三是完善营商环境共建共享渠道机制,开拓多元参与营商环境打造提升的渠道,建立由“政府+市场+个体”三位一体的营商服务供给机制,完善“政府辅助+市场甄选”的营商环境共建共享模式,增强营商环境的市场适配性与服务力,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优化的效率。四是探索建立跨区域的行政联动机制,以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试点改革为契机,同步建立跨行政区跨域联动机制,构建新型的地方政府战略合作关系,形成营商环境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泛域合力,避免政策“内卷”,提升政府公共投入的使用效益。五是加强地方政府信誉环境的建设与改善,综合外部监督和内部考核等多方力量,建立政府信用约束机制,提升地方政府信用美誉度,增强市场主体投资信心,形成营商环境自我完善的内生动力。

(五) 以坚持创新服务供给技术平台为支撑

进入新时代以来,市场模式与技术应用加速演进,伴随以创新、共享等为突出特征的新生产、新消费理念的形成,以及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技术等嵌入,传统市场经济被迫进行迭代,迫切需要完备的服务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是一种因时而动、顺势而为的体制,要彰显出极强的时代适配性

和市场亲和力,而这种适配性和亲和力就直观体现在对服务供给技术及平台的不断创新上。具体来说:一是加快推进市场“数字化”转型,充分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兴科技,开展市场服务技术创新与改造提升,聚力突破传统线下接触式服务模式面临的空间和效率制约,促进市场综合服务提速增效。二是加快打造“扁平化”政务服务系统,立足机构改革成果,推进政府及相关部门工作向外靠、向前行,缩短市场与政府的距离,实现各项职能的无缝对接,为社会提供整体的、无缝隙的服务。三是加快搭建“集成化”市场服务平台,加快推进不同要素及主体之间的纵横联动与协同合作,打破信息壁垒、破除组织局限,建立形式各异、功能多元的市场综合服务平台,并以此为载体,深度普及一站式服务、集成化的市场综合服务供给模式。四是加快创新“参与式”服务供给模式,不断探索政府公共管理服务与市场综合服务的有效接口,构建公共组织、政府员工和公众全面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机制,有的放矢地推进公共管理服务形式的转型,逐步形成政府购买和主体参与的服务供给模式。

五、结 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社会建设里程碑式的目标,其既有现实应然性,也有历史必然性。有研究者认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立足于“市场”中性本质前提下,科学理解与准确把握“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判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孕育发展过程中,我国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也正是这种矢志不渝的探索实践,才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涵,即要在赓续一系列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现进一步的创新提升。具体而言,关键是要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先决条件、以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核心支撑、以政策调控与市场激励相结合作为基本方法,并聚焦多种所有制经济活力更强、价格机制反应灵敏度更高、政策引导调控靶向更准、制度机制规制强度更大等新的发展目标。而为了尽快实现这些目标,则要以不断提升党和政府执政能力为前提、以持续完善要素配置体制机制为核心、以更加优化产权权能结构体系为关键、以坚持创新服务供给技术平台为支撑、以聚力营造共建共治共享营商环境为抓手。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也必然会继续丰富深化,也不可避免可能对现有认识及实践带来变革,笔者也诚邀方家批评指正,以期获得新的研究启示。

[参 考 文 献]

- [1] 常庆欣.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J].山东社会科学,2021(02):20-25.
- [2] 林志友,李子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维论析[J].经济学家,2021(09):100-108.
- [3] 刘戒骄,刘冰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与核心制度[J].财经问题研究,2023(01):27-38.
- [4] 庞庆明.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性[J].经济纵横,2022(01):10-16.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5] 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6]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8]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9] 钟瑛.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与评价研究述评[J].中共党史资料,2007(04):165-174.
- [20] 中国产业体系的制度结构研究课题组.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效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与DEA检验的经济史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15(05):116-123+128.
- [21]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4]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5]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6] 贾晓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实践历程与新时代的发展[J].西部学刊,2022(01):158-162.
- [27]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28]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29] 林志友,曹倩.论新时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方略[J].科学社会主义,2022(02):106-114.
- [30] 宁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本质与构建[J].人民论坛,2022(24):18-21.
- [31] 唐任伍.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内涵、内容呈现和路径选择[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1):1-10.
- [32] 林志友,曹倩.论新时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方略[J].科学社会主义,2022(02):106-114.
- [33] 文丰安,杨婷.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内在关联、逻辑理路与理性审视[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5):5-16.
- [34] 覃毅.中国收入分配七十年:改革实践与理论演进[J].产业经济评论,2020(05):109-124.
- [35] 李明星,马永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与实践理路[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3(06):22-31.
- [36] 任保平,吕春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与前瞻[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8(06):3-10.
- [37] 高尚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J].前线,2013(12):34-37.
- [38] 韩文龙,晏宇翔.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02):44-68.
- [39] 刘儒,郭荔.新中国70年价格机制改革:演进逻辑、显著特征与基本经验[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3):96-103.
- [40] 高倩.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J].经济研究导刊,2022(03):4-6.
- [41] 汪同三.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宏观调控及其经验教训[J].新金融,2005(07):8-12.
- [42] 任保平,吕春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与前瞻[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8(06):3-10.
- [4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001).
- [44] 庞庆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01):173-178.
- [45] 税强.论保持党的先进性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致性[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12-16.
- [46] 李宜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区域、政府与市场的协调整合[J].中国西部,2021(06):43-48.
- [47] 洪银兴.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J].经济学家,2020(02):5-14.

- [48] 张琦. 当前我国产权制度体系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考[J]. 太平洋学报, 2006(02): 18-25.
- [49] 何地, 林木西.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产业结构升级[J]. 经济体制改革, 2021(05): 99-105.
- [50]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N]. 中国市场监管报, 2019-03-12.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oretical Logic, Target Orientation and Path Countermeasures

Li Mingxing¹ Chen Bi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2. Sichuan Jinguo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o., LTD, Chengdu 610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new era,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constructing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have become crucial issues for dri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posits that building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should be predicated upon upholding the cor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promoting common development of public ownership and various forms of ownership, integrating policy regulation with market incentives as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Furthermore, it is essential to ensure that various forms of ownership exhibit greater vitality, price mechanisms demonstrate heightened sensitivity, and policy guidance and regulation are more precisely targeted. The key lies in continuously enhancing the governing capacity of both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perpetually refin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factor allocation, optimizing 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adhering to innovative service supply platforms, as well as fostering a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shared business endeavors.

Keywords: market economy system; ability to govern; price mechanism; business environment

[责任编辑: 左福生 邹柳馨]